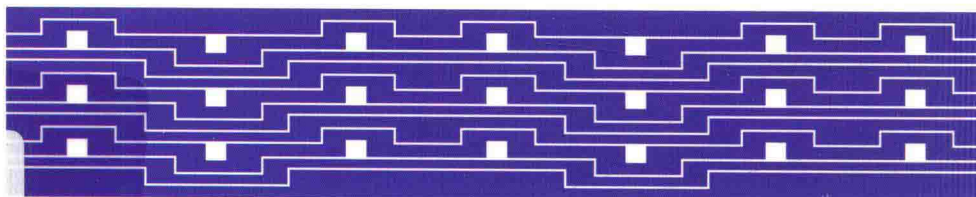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
丛书主编 黄继刚 胡友峰

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

杨文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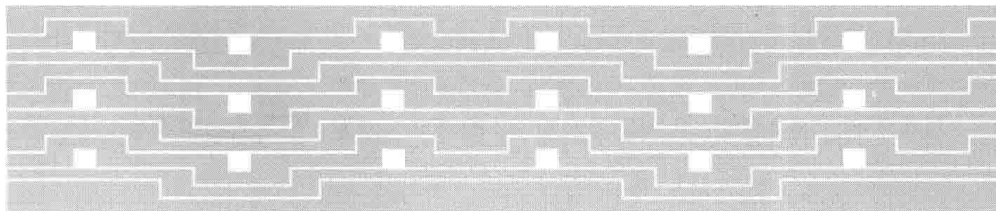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

丛书主编 黄继刚 胡友峰

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

杨文臣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杨文臣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6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黄继刚, 胡友峰主编
ISBN 978-7-307-19438-0

I. 孙… II. 杨… III. 孙方友—小说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9386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03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438-0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继刚、胡友峰两位博士主编了一套书系，让我为之写一个总序，我欣然从命，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对于该书系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其次是觉得该套书系的作者视角比较有特点。

现分别来说：其一，该套书系的内容是“文艺批评新视野”，这个视角符合我们文艺发展的时代性。众所周知，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是特定经济社会之反映。当前时代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社会，是对于现代之反思与超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形容这个后现代社会，可以称之为“共生的时代”，以之与传统的各种“中心论”相对；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时代”，以之与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相对；可以称之为“网络时代”，以之与传统的纸质文化时代相对；可以称之为“东方文化复兴时代”，以之与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相对，还可以称之为“跨文化研究时代”，以之与传统界限明晰的研究相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该套书系几乎包括了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容，黄继刚的《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以文学中的景观书写为研究对象，可谓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研究；胡友峰的《媒介生态与当代文学》是对于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研究对象和审美属性的探讨；戴孝军的《和谐与超越：中西传统建筑审美文化比较》与何飞雁的《彩调的审美文化研究》也是一种跨文化多元性研究；康毅的《露西·伊丽格瑞近期思想研究》与何书岚的《中国诗学中的人权思想研究》都是对于人之生存状态的一种开放式研讨；而李鹏飞的《中古诗歌用典美学研究》则是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全新探赜。总之该套书系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全新视角，也给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清新的学术气息，这无疑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

其二，是该套书系的作者都是“75后”、“80后”的年轻博士，这一代学者是将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力军，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未来。而我们都已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真的是喟叹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像我这样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学人都早已经步入老年，更遑论我们的师辈。因此，新一代与一代新人的崭露头角已经是时代精神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丛书的作者们就属于这样的新一代，他们在本套书系中表现出来的锐气才力与研究实力正是这些新人们发展前景的美好表征。我期待并盼望着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快速成长，飞得更高，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就。这也是我在济南三伏天的炎热之中写了如上寄语的真实用意所在。

曾繁仁*

2016年7月18日

* 曾繁仁，山东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艺术学评议组召集人，长期以来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组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艺术学组组长。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当下已经身处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科技似乎从未停止过大规模前进的步伐，而文艺的地盘逐渐被蚕食并日益边缘，科学实用的意向将人文虚致的精神挤到了墙角，“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①的强弱悬殊已经越来越不成比例。如今我们将文学的中心/边缘、实用/无用等问题拿来讨论，这本身业已昭示出现代文化的基本困境：它时时处在工具理性和实用精神的压迫之中，所为甚微。这一情形也正是目前文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逼仄现实。文艺研究活动作为一门“学问”和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可能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也无法参与到社会形态的具体建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是提供了关于人之存在的不同价值观念。所以，尽管粗粝的生存需求和社会压力时常将文艺研究者从思想的高峰拽下，抛入到现实环境的无尽撕扯当中，但是“学问”本身自有其意义。胡塞尔现象学曾经帮助我们区分界定了两个概念：指明和证明，就文艺研究活动而言，其并不证明什么，但是它时时在向我们指明，这些为它看见和指明的东西，就是可能性，即人生、世界何以展开、如何展开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非要将自己的观念视为唯一原则而强加于人，而是提供一种内省的思想方法来帮助我们破除灵魂的栅栏，并使得自我呈现出应然的状态。借此，我们保持一份“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谦逊和惶恐，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天地和思想涟漪中自得其乐，在书斋当中的“玄思妙想”、“坐而论道”都可谓

^① “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Einstein Meets Magritte）是199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其旨在探究不同学科的边界以及对话交流的可能性。

是对当下甚嚣尘上之功利关怀的最好回应，毕竟审慎执着的学术追寻仍然要比琐碎无序的日常生活荣耀得多，正如尼采在《快乐的智慧》中所言，假若能参悟读懂自己的灵魂，自身那种须臾不可或离的意义将徐徐呈现，而“生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不断将自身以及所遭遇的一切转化为光和火”^①。就此而言，文艺研究也许不会使我们富有，但却会使我们终得自由。

文艺研究者素以学术研究中的“思”、“史”、“诗”视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并在一种不知足的引颈前瞻氛围中昭示出应对未来的能力。而学术研究上的承传有自、薪火绵延更是需要吁请青年文脉的加入，尤其是需要聆听“75后”、“80后”学者所发出的声音。就此，编者虽不敢妄言此丛书会“雏凤清于老凤声”，但是年轻学者们不囿于陈说、溯迎而上的努力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就这套《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而言，语境化的分析和历史性的考察是我们甄选文丛时的唯一判断标准。所谓“求理于问答之外”，作者们大多能够透过浓重的历史烟雾来重新论证理论之自明性，其论著或者是隐含着一种新的提问方式，或者是用新方法来开启新视野，或者是以新角度来探讨新问题，整体上兼具学术差异性和理论互文性之特征，而作者们许多篇章的文本分析巨细靡遗、秘响旁通，也堪称精彩。编者希冀本套丛书能够抛砖引玉，在学界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回应，当然也因编者缺乏经验，谬误在所难免，还请业内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非常感谢康毅、李鹏飞、何书岚、何飞雁、戴孝军、潘国好、白宪娟等好友的信任，诸君大多师出名门，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勤勉刻苦，笔健如犁，耕耘不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当编者发出邀请，各位作者欣然将各自的博士论文纳入到我和友峰兄策划主编的这套丛书当中，孔子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此谓也。

^① [德] 尼采著，王雨译：《快乐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我想接下来应该是编者宣读完开场白之后，默默退下，而诸位优秀的思想演员将在这之后陆续登场亮相——

黄继刚 胡友峰

2016年4月

序

《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是杨文臣博士最新的学术成果。文臣师从曾经担任过山东大学校长、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曾繁仁先生，并在其指导下进行西方环境美学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在研究西方环境美学的时候，文臣还从事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编选与作品研究，目前除已经出版的研究资料汇编《张宇研究》、《墨白研究》和评论专著《墨白小说关键词》外，还有即将付梓的资料汇编《孙方友研究》与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

孙方友于1949年出生在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即其新笔记体小说《小镇人物》中的颍河镇。孙方友2013年7月26日因心肌梗塞在郑州不幸辞世，他的《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笔记体小说的绝响。说绝响实不为过，世人言“古有《聊斋志异》，今有《陈州笔记》”，言之不谬也。孙方友所创造的独立的文学世界，除去天资，使其成为绝响的还有我们所处的时代。20世纪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像这样朝代更替的历史，在今后恐怕很难再现。即便天有不测风云，但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信息革命到网络时代这样大幅度的在思想和认知观念上的转换与更替恐怕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也不会重叠。而这些，我们都能从孙方友的《陈州笔记》里得到印证。所谓时代造英雄，即是此说。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形成的文体屈指可数。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笔记体小说从“五四”以来在经过百年的历练之后，到了孙方友的《陈州笔记》这里，终于筑就丰碑，成为一座高峰。说孙方友是新笔记体小说的奠基人，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从叙事语

言的“一石三鸟”，到故事结构的“翻三番”，再到故事情节的“奇、妙、绝”，孙方友确实为新笔记体小说注入了太多的诗学元素，使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笔记体小说最终形成一个成熟的文体。孙方友作为新笔记体小说的奠基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还远远没有被认识。所以，对孙方友小说价值的认识与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始。

感谢杨文臣博士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以中、西方哲学和文学批评标准为依据，对孙方友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精髓、以中华民族 20 世纪风云变幻的历程为基础创造的独立的文学世界所作的考察；感谢他对孙方友的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关系的梳理，并让我们认识到孙方友以艺术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人性的真实为标准构建的文学世界所传达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生生不息的生命信仰。感谢他使我们厘清了孙方友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对中国传统德性文化与民间酒神精神的弘扬；对“左”倾运动的谴责和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左”倾思想根源和土壤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人世间生命的尊重，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孙方友文学世界的价值之所在。

应该说，杨文臣博士的《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是一部开先之作，对孙方友文学遗产的整理与研究，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墨白

2017 年元月 10 日

前言

孙方友与共和国同龄，于1949年9月9日出生在河南省淮阳县颍河边上的新站镇，也就是后来在他和同为作家的三弟墨白的笔下经常出现的颍河镇。从地理空间上看，这个小镇地处中原腹地三个城镇的中心，西北二十公里是周口，东南十公里是项城，东北二十公里是淮阳。颍河发源于中岳嵩山，蜿蜒东南而下，在流经周口时又注入了沙河与贾鲁河，再往东南流经新站镇、项城、沈丘、阜阳，到安徽的正阳关汇入淮河。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版图中，这条河流和这些城镇并不显眼，但过去曾经非常辉煌。淮阳古称宛丘、陈和陈州，传说中的“三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均在此建都。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曾发生在这里，诸如，孔子来陈游说曾被困于此，陈胜、吴广在此建立张楚政权，包公陈州粜米，等等。李白、李商隐、卢纶、苏轼、苏辙、张耒、曾巩等文人骚客，都曾游历过陈州，题词作诗，留下千古绝唱。周口在明清时期是西北与江南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号称“小武汉”，是河南四大商业重镇之一。项城则是鼎鼎大名的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故里。现在已少为人知的颍河也曾十分有名，在夏、商、周时期名为颍水，“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①，是淮河的重要支流，一直处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②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颍河的航运还很繁忙，颍河镇也相当昌盛，远近闻名。墨白回忆道：

① 酈道远著，陈桥驿、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8页。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那个时候我们镇上有四个码头：镇子最西边是盐业仓库、粮食仓库和木材公司的码头，从漯河漂来的竹排和原木都停泊在那里。镇中是过河的渡船码头，镇东是土产仓库码头，再往东就是煤业公司的码头。货船来了，一排靠在河岸边，船舱那样深，那样大，装载着无数的秘密，船民南腔北调，带有异国的风情。^①

那之前的颍河镇，人烟阜盛，客商云集。镇子里建有私塾、道馆、延庆寺、清真寺、基督教堂，汇聚了中外最重要的几种宗教信仰，还有来自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建造的山陕会馆，以及相当宏伟的城墙，其繁盛程度可以想象。孙方友也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

我住的小镇也非常古老，有一千多年了。我记事的时候，大街上是麻石铺路，一街两行全是“道人帽”式的明清建筑和店铺，街道也比较窄。每到春节年集的时候，“街”就无限限制地朝外扩展。那时候，颍河通航，从皖地去漯河的商船络绎不绝。由于镇子古老，文化氛围很浓。有画家、书法家、《易经》学家，还有博古通今的老右派。他们多是镇里显赫家庭的后裔，比如西街的马家、东街的雷家，上辈都出过京官。也就是说，这个镇子本身就很传奇。^②

悠久的历史 and 浓郁文化氛围的熏陶，对日后孙方友的创作有着莫大的影响。

17岁之前，孙方友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就在他出生那一年，他的父亲孙多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之后为地方经济工作作出过突出贡献，在当地算是名动一时的人物。尤其是1962年困难时期，

① 龚奎林：《历史、经验、责任与创作——墨白访谈录》，《西湖》2010年第2期。

② 孙青瑜：《尽力把故乡写成一片原始森林——孙方友访谈录》，《西湖》2012年第5期。

父亲凭借卓越的活动能力从漯河给家乡采购了大量煤炭，一度让县领导都颇为感动。或许正是因为有一个经常奔波在外的父亲，少年孙方友的眼界也超出了身边的那些玩伴。他酷爱阅读，拥有一个让同伴们无比羡慕的书箱，里面珍藏着满满一箱子小人书，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林冲雪夜上梁山》、《崂山道士》、《杨七郎打擂》、《画中人》、《马兰花》、《济公斗蟋蟀》、《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从这些小人书中，他最早接受了文学的滋养。偶尔，他会去周口找父亲，回来肚子里便多了许多历史掌故和逸闻趣事。^①那个时候，孙方友的生命中充满了阳光，虽然生活和别人家一样清苦。

但到了1966年，孙家的境况急转直下。“四清运动”波及孙多喜，他被指控为贪污犯，煤在运输中的损耗，开展工作必需的花费，都成了他贪污的罪证。政治是如此残酷，转眼间，功臣沦为阶下囚。次年，他被判刑三年，送黄泛区农场劳教。为了退赔“亏空”的公款，家里所有能换钱的家具、衣服都被拉走，房子也被拆掉。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重负像石头一样压在孙方友一家人身上。这种情况下，孙方友只能中断学业。为了生计，他到生产队的牲口屋里帮槽，挨家挨户去人家厕所里挑大粪，晚上和弟弟们帮母亲推石磨到深夜，有时间还要带弟弟妹妹们去颍河里捞砂礅卖给公路段。初冬的河水冰冷刺骨，加上时不时脚会被砂礅刺破，滋味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孙方友就是生产队里的整劳力，他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儿，却得不到和大人一样的工分，不仅如此，还常常被生产队派去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墨白在《我的大哥孙方友》中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

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大哥和二哥被派到离我们镇上一百六十里路的漯河去拉生活用煤。他们回来的时候天下了大雪，颍河里结了冰，不能行船，年三十他们冒着大雪回到我们对岸那个小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的大堤上等他

^① 墨白：《梦中之梦》，《山花》2009年第24期。

们。隔着宽宽的河道我看到了他们，我就叫了一句，大哥——一句话没有喊出来泪水就顺着我的面颊流下来，大哥在对岸叫，妈——二哥也叫妈——，可是他们却过不了河。妈叫一声，乖——声音就嘶哑了。

那一天，我和母亲看着大哥二哥沿着河道向东走去，他们要冒着鹅毛大雪到离我们家二十路的项城去，那里才有一座桥，然后他们再往回走。大哥的脚步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在黄昏里，在我的感觉里发出经久不息的嚓嚓的声响，那个时候镇子里就响起了鞭炮声。^①

和身体上的劳累、苦痛相比，精神上的折磨也许更难以令人承受。因为父亲入狱，孙方友成了“可教子女”，经常被叫去参加可教子女会，和他相恋的姑娘因此与他分手。心气倔强的孙方友为了争口气跑到项城买回一台收音机，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奢侈的了，但是，二伯父不让听，因为他的可教子女的身份会招致收听敌台的嫌疑。

艰难的生存环境，更能彰显出生命的强悍激扬。面对不公，孙方友也愤愤不平，但并不消沉，依然热烈地生活。1967年，新站公社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时样板戏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推广，豫剧团因而成为宣传队的支柱。孙方友并没有因为自己遭受的不公而对宣传队持敌视、仇恨的态度，相反，他费尽心思并成功地跻身其中，多年之后墨白在回忆这件事时也颇觉不可思议。当然，作为“可教子女”，他没有资格扮演样板戏中的革命英雄，只能扮演一些小角色或反派，但他不以为意。他演过《白毛女》里面的穆仁智、《沙家浜》里面的刘副官、《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以及《红灯记》里面的鸠山。鸠山一角让他红遍了颍河两岸，他头上戴着一个用猪尿泡做成的光头道具，几乎演遍了那一带所有的村庄。那段生活应该就是他早期生活历程中一次小小的辉煌，后来他创作的中篇小说《艺术皇冠》^②就是以此为原型的。

① 墨白：《我的大哥孙方友》，《时代文学》2010年第3期。

② 孙方友：《艺术皇冠》（中篇小说），《人间》1987年第1期。

中国的地方戏尤其像豫剧、秦腔和梆子，本身都和民间狂欢文化^①有着深厚渊源，浑厚高亢的唱腔、刚硬有力的念词和急促热烈的节奏，都能让人直接感受到生命力的饱涨喷涌。虽然样板戏的内容设计是要维护思想的“纯洁”，但一裹上戏剧的外壳，民间狂欢文化中的元素就冲破甚至淹没了思想的防线，这在反面人物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们的生命不受那种严苛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驳杂、自由，因而更显生命活力。这可能是样板戏思想水准不高但仍有审美价值的原因之一。我们无从得知孙方友本就强大的生命力是否因他的“演艺生涯”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饰演反面角色对他是否一种“幸运”，至少这段经历为他那段晦暗的岁月镀上了些许绚烂的色泽，也必定对他未来的创作有所滋养。我们看到，孙方友对“匪”这个群体似乎非常青睐，不仅写了大量以匪为题材的作品，当其他题材作品出于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一个功能性角色时，他也多让匪来担当。抛开社会学和伦理学上的审视，就美学而言，孙方友对匪的青睐可能就是因为匪身上那种原始的、野性的、强炽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了他。当然，这与他饰演鸠山的经历是否有关系，我们无法断言。

成为“名角”并不能改变孙方友的命运。这段时间，为了填饱肚子，他拉架子车搞运输、挑担卖豆腐、去公路段当临时工……1970年秋天，“一打三反”的时候，父亲的问题又被人重新提起，他的家再次被抄。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和挣扎后，1972年春天孙方友被迫前往新疆察布查尔谋生。九个月的流浪生活中，他干过深山伐木、窑场打土坯、泥瓦匠、卖冰棍等多种营生，并一度被当作

① 苏联文艺理论家 M. M. 巴赫金指出，民间的狂欢文化是和官方的正统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形态。官方文化要对生命施加限制和束缚来维护等级和秩序，而狂欢文化则致力于打破一切限制和束缚，自由地宣泄生命的激情和欢乐。除了各种各样的狂欢节，包含笑谑、诙谐、怪诞等元素的文学——诸如拉伯雷的《巨人传》——也是狂欢文化的产物和体现。我国民俗学大师钟敬文指出，狂欢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文化的精髓就是其蕴含的狂欢精神。

“盲流”关押起来。在中篇《荒漠的精灵》^①和《盲流》^②中，孙方友书写了这段生活经历，其艰辛悲苦，让人唏嘘不已。毋庸讳言，这两部早期的作品并不成功，叙事缺乏节制，文字拖沓散漫，内蕴不足。除了这时他在艺术层面上的修炼还不够，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孙方友的天性似乎就不适合书写这种“伤痕”主题，他不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生生死死，不能回避荒诞的政治施加于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苦痛，但他又不擅长或不愿意悲悲切切地倾诉，这种内在冲突的外化，使得这两部自传式的作品在小说氛围的营造和情感的传达之间显得颇不和谐，给人以混乱和嘈杂的感觉。不过，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孙方友强大的人格力量和生命意志。在《盲流》中，他写到“扒火车”被发现，乘警看到榨不出什么油水，“便照屁股一脚，让我滚了蛋”！

滚蛋就滚蛋！完蛋都不怕，哪个还怕滚蛋不成！无产者四海为家，黄土高原才算老几？于是，我便大义凛然地出了车站。兰州是西北工业区，俺还是首次光临。昨天上午偷偷地进了公园，乐悠悠地逛了五泉山，浏览了著名的甘露、掬月、摸底、蒙惠五眼泉水和动物园。面对那气势雄伟，结构坚固、金碧辉煌的层楼叠阁，顿觉有飘飘欲仙之感。

《沙漠的精灵》中面对广袤、死寂、飞鸟不至的大戈壁，流浪者们惊骇之余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听人说，这儿曾是古人要开辟的“丝绸之路”，后来走不通，自然少了勇气，终于改了道儿。这些老朽像是极随便，说改就改了！俺们改不得，眼前就这么一条路！若比起那些无路可走的人，我们还是幸运。好赖还算有路可走嘛！

这年头，有路可走皆算大福大贵！我等吉星照顶，自然禁

① 孙方友：《荒漠的精灵》（中篇小说），《莽原》1985年第5期。

② 孙方友：《盲流》（中篇小说），《飞天》1986年第10期。

不住喧闹一通。

无论怎样的苦难，从孙方友的笔下流出时都“带着一种喜剧的传奇魅力”。当女儿孙青瑜问及他对于苦难的这种姿态时，他云淡风轻地说：“将苦难当成一种‘乐’去享受可能是我的性格吧”^①。这就是孙方友。不以苦为苦，不做悲壮之态，且不拿苦难标榜自己。这是真正的强大。

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孙方友重操旧业，进了公社组织的宣传队。这次他不是去演革命样板戏，而是改说山东快书。虽然和豫剧有很大不同，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山东快书的形式同样包含了一种畅快淋漓的生命激情。也就是说，在形式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的层面上，山东快书和豫剧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些成功者除了后天的努力，其先天禀赋也是很重要的。孙方友就是这样有着优良的先天禀赋的个体，无论干什么——演豫剧、说快书还是搞文学，他都能做得非常出色。他的山东快书《赔茶壶》在县里汇演时被选中准备去地区演出，他因此得以在县里逗留了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当时孙方友他们的宣传队住在太昊陵的统天殿里，而太昊陵也是县文化馆的驻地。孙方友因而得以结识了文化馆的霍进善老先生。霍老先生是一个淮阳通，三皇五帝，传说掌故，无所不晓。没事的时候孙方友就缠着霍老先生给他“讲古”，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淮阳地方文化的了解、兴趣和感情。当时淮阳还有一个北京广播事业文工团设立的“五七”干校，说相声的侯宝林、马季、唐杰忠，说山东快书的赵连甲等许多曲艺界名流都到这里劳动过，孙方友去“五七”农场向他们求教，加深了在曲艺方面的造诣。这些文化和曲艺方面的知识后来成了孙方友小说创作的素材，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了他的创作道路和艺术形式的选择。

对他影响更大的是这段时间他还结识了自己文学道路的领路

^① 孙青瑜：《尽力把故乡写成一片原始森林——孙方友访谈录》，《西湖》2012年第5期。